

壹、西方環境主體經驗的故事

一、古希臘「宇宙中心主義的」環境想像

（一）摹本（Copies）

一直觀、辨識與想像

在古希臘宇宙論時期，除了詭智學派與蘇格拉底以外，一些如：埃歐尼亞學派（The Ionian School）、畢達哥拉斯學派（The Pythagorean School）、赫拉克里特斯（Heraclitus）等人，多以「自然存在」（Physis），即「外在實存的世界」（The External World）這樣子的想法作為環境哲學討論的話題。

由於當時人類本身的自我意識仍未成熟與發展，人的生存環境剛開始只能經由直觀思辨，模擬與想像各類自然生成物靜態的形象。當時柏拉圖（Plato）將這些普遍性的個別範例看成只是物理世界中的摹本（Copies）。

（二）狄米奧吉（Demiurge）

—環境動力因的觀念

柏拉圖個人在《The Timaeus》這本書中則認為：我們所見到的物理世界，只是「變動界」，它是「真實」理型世界中的不完美摹本，而理型世界只有透過思想才能加以掌握。由於宇宙是不完美的，必須由某位「半個衝動(demi-urge)」或神聖的「勞動藝術家」，將理型賦予缺乏形式的物質。……時間在我們的觀念中只是一系列的數字，藉以衡量這座不夠標準的宇宙如何不斷的流變，……而世界中的每個靈魂在死亡之後也將會回歸到一個起點，……（何晝瑰，1990）。

在書中，柏拉圖也對許多尚未成形的，缺乏形式的物質或現實事物本身生成變化的情形，提出了「混沌(Chora)」這樣一個名字，來想像當時人類生存環境經驗範疇中一些知覺無法捕捉的交互變動現象，他認為「混沌」是永恆存在，自然生滅的，宇宙中的現

實存在就是「狄米奧吉」結合了「非限定的混沌」與「限定的形相」而形成的（傅偉勳，2004）。因此，「狄米奧吉」在柏拉圖的想法中是一種環境動力循環的設計之神。

從這段環境動力因「狄米奧吉」的想法中，柏拉圖點明了實存的自然現象是不斷循環變化而沒有止境的形態，其中事物之間也互相有層序、制約的整體存在概念。

（三）「主動理性」的宇宙觀

亞里斯多德（Aristotle）的時候，也師法柏拉圖將自然生成視為一動態永恆論理秩序的存在層級，並在自然哲學（物理學）與動物學經驗中探討物種環境關係與互生的現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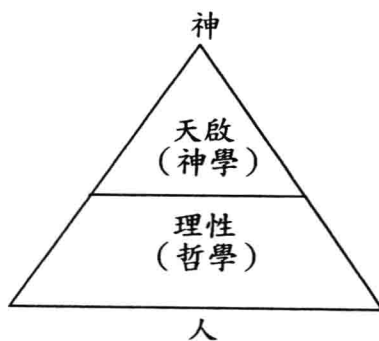
亞氏在《自然學》與《靈魂論》中解釋自然事物的整體，自然事物本身具有一種內在轉變的傾向，以更高的形式或顯態為內在轉變的目的。自然界的運動

不外是形式範塑物質，驅策物質而向高層次的存在「進化」著的努力過程。形式是驅策物質「進化」的動力，物質則阻撓「進化」的抵抗因素。在價值上形式所以高於物質，乃因前者是規定物質的種類或內在本質，而為物質的趨向目的，…… 個體終必死滅，但其種類〈形相〉或內在本質則永恆不朽……（傅偉勳，2004）。一切運動（環境的動力因）皆須預設空間與時間，宇宙是以地球為中心而形成向心式的天體與恆星，…… 而人類的靈魂受到包容宇宙的「上帝」（形上學的最高層級）所支配……。

亞里斯多德此一「主動理性」的環境想像（Nous Poietitos）一直左右著中世紀「上帝」與其他存在者之間的關係。基本上此期是屬於「宇宙中心主義的」（Cosmo-centric）環境想像時期。

二、中世紀「神中心主義的」宗教環境

中世紀以後的耶教環境哲學概念，則繼續融合古希臘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的思想精華以及基督教本身的啟示真理，如以三角形來表示的話（如附圖一），上方的小三角形代表信仰層域，梯形則表示理性層域，兩者就是恩典（Grace）與自然（Nature）、教養（Dogma）與知識（Knowledge）抑或啟示真理（Revealed truth）與理性真理（Rational truth）的對立關係，如附圖一（傅偉勳，2004）。



附圖一、中世紀「神中心主義」環境哲學的絕對預設

兩者在當時的神學家看來是相輔相成的，由於當時希望藉由理性的自然知識來輔助證成上帝永恆不變而絕對真理的環境，也就是宗教格律所管轄的環境，一個所謂「神中心主義的」(Theo-centric) 環境思想形態。

但是，在此一「精神快樂」的基督神喻世界與當時相對存在的騎士文學、民族英雄史詩與其他市井文學之中，我們不難查覺其間反應了當時人類一種普遍矛盾的二元對立的情形，那就是：「理性」與「原慾」。在文學家布克哈特所著《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中的一段話曾經談到：

『在中世紀，人類意識的兩方面，內心自省與對外觀察都一樣一直在一層共同的紗幕之下，處於睡眠或半醒的狀態。這層紗幕是由信仰、幻想和幼稚的偏見織成的，透過它向外看，世界和歷史都罩上了一層奇怪的色彩。人只能意識到他自己是一個種族、民族、黨派、家族或社會集團的一員，一切只能通過某

些一般的範疇而意識到自己……。」(徐葆耕譯註，2007)。

如果說，當時的環境真的是「理性」壓抑了人性的「原慾」，人一生下來就得默默承受層層疊疊的「原罪」這樣一個包袱，這是早期「天啟神學」絕對真理的話，意味人就永遠無法去思考事物的本質，挑戰現實存在的悲劇（也就是原罪），如此真是一個解不開的漩渦，這種情形直到文藝復興時期「人性本質解放」之後，才得到「相對理性觀念」與「宗教批判哲學」的平反。

三、文藝復興「人本主義的」環境省思

（一）人性本質的發現

中世紀重視積極的宗教實踐態度，缺乏亞里斯多德「省思」、「審慮」（Prudence）之德或睿智，在當時一直是許多人詬病的話題。

這種現象一直到了近代文藝復興時期的西塞羅（Cicero）提出「人本主義」（Humanism），以及當時新興資產階級的人文主義者，共同以復興古希臘文化而進行「反對封建」、「反對中世紀傳統基督教教會」的思想運動。試圖建構合理性的人神關係之後，人性的本質（Essence）才逐漸地被解放於環境之中，取代了存在十數個世紀，神譽式、典範式、非人性的「神一人」的環境觀，也開始了西方世界往後數百年來以尊重「人的本性」、「人本」的新思想運動，人性化的潮流就是在此時此地萌芽。

（二）人本思想

在挑戰宗教神權的方面，則直到德意志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在 1517 年提出以「聖經」為一種精神中心信仰的觀念來取代「神權」之後，教會的權利才逐漸被批判、質疑，腐化之後也催生了民族政治哲學，推崇科學理性、經驗實證、知識哲學、人文藝術、方法論述……等等，文藝復興時期由於尊重、平等對待「人性的哲學思想觀」，也改變了西方永恆的神律概念，從此人性多元化的內在矛盾、辨証的語言不斷，而發展出以人本思想與科學（人學）為主的環境思潮。

這個衝破中世紀神學的桎梏，首次倡導人類理性的自律性優位，專就「人性中心主義的」（Anthropo-centric）環境思維模式（傅偉勳，2004），啟蒙了「近代哲學之父」笛卡兒（Rene Descartes）與斯賓諾莎（Baruch de Spinoza）等等巨哲，更開創了近代以人存在本身為中心性的理性探求……

……由是而生「主／客的對立性」與「心／物二元性」的知識文化、經驗實踐與道德倫理……等等各方面的人本環境省思與科學哲學論述。

當時，在人文藝術方面的成就，除了大家耳熟能詳的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米開蘭基羅之外，重要的文哲學家還有：桂冠詩人佩脫拉克、《十日談》的薄加丘、精通文學與科學的拉伯雷、創作《哈姆雷特》的劇作家莎士比亞、《唐吉訶德》的塞萬提斯……等等許多人。

特別提到近代戲劇創作之父莎士比亞，在他的創作歲月當中，不僅改寫了西方戲劇早期 Parrhesia 式的雙向對話形態，而將焦點鎖定在「觀賞者內心世界與劇中人物內心世界的交融濡染、感同身受」；開門見山的懸念式劇情，也強烈的呈現出非常鮮明的蒙太奇手法。其他文學詩歌方面亦是非常的出色，真是西方世界的文學泰斗。

另一位值得一提的西班牙文學家塞萬提斯所寫的《唐吉訶德》更將生活中嚴肅與滑稽、悲劇與喜劇、瑣碎與混亂、高尚與庸俗、搞笑與難過……，平凡人類的生活感情融入了文學小說之中。英國浪漫主義文學拜倫就曾說：

『唐吉訶德是一個令人感傷的故事，它越是令人發笑，則越使人感到難過。這位英雄是主持正義的，制服壞人是他的唯一宗旨。正是那些美德使他發了瘋。』（徐葆耕，2007）

此一人本主義的思想，一直綿延到 18 世紀形成了啟蒙文學運動與浪漫主義思潮，推出如歌德（Goethe）的《浮士德》、盧梭的《懺悔錄》，雨果的《鐘樓怪人》……等等文學經典。人本主義與浪漫文學的理想在此時達到了最高度的精神表現。

四、文藝復興「科學主義的」環境改造

(一) 科學主義

文藝復興的另一個「人與環境」的思想潮流，是一支以畢達哥拉斯學派的天文與數理的觀念發展——包括：歐幾里得的幾何學觀念、阿基米德的力學觀念等等的自然科學主義或科學理性主義，例如大家耳熟能詳的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1473-1543）太陽中心理論，克卜勒（Johannes Kepler，1571-1630）、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的星體觀與運動定律，牛頓爵士（Sir Isaac Newton，1642-1727）的萬有引力與近代物理科學……等等。

自此而後一些科學方法論，宇宙演化觀，因果關係變化的概念，以及物理量性概念的語言，如「質量」（Mass）、「能量」（Energy）、「力量」（Force）、「運動」（Motion）、「空間」（Space）、「時間」（Time）、「速

度」(Velocity)、「定律」(Laws)、「實體」、「屬性」……等等，在此時被提出而發展成為工業革命時期普遍性的教育與知識。

總之，為了滿足當時新興資產階級的各類須要，光是文哲的思考是不夠的，生命的演進終究得與現實的物質環境保持相互依賴的存在關係。

(二) 經驗論與因果論

但是，在經驗論方面英國的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當時並不支持笛卡爾統一理性的思考（即整體普遍性環境的假說或反省），培根認為近代的學問必須建設在「人類個別經驗」的根源真理之上，因此應從統一理性思維的周邊或實際經驗，腳踏實地的去作哲學、科學、文學、藝術等等的探索，也就是說：科學的思考，必須以理性的思維為中心、以理性的經驗為唯一可靠的出發點。「理性的科學」

必須經由經驗實證來獲得，而不是靠毫無根據的假說來求證。

在環境動力因的機制方面，首推霍布斯，他與培根、笛卡爾等人都深信唯有正確的方法，才是論証知識、推演因果的主要關鍵。但他援用了太多歐氏幾何學與克布勒自然動力學定律的概念，來詮釋人類社會的思想行為環境，同時把這種絕對因果的知識應用到政治的領域上。在論述方面也排除了其他神學觀、歷史觀、人性觀……等等面相（傅偉勳，2006）。雖然他的機械主義唯物論獨樹一幟，卻很難操作使用。基本上，他與培根都是經驗決定論的支持者。

這些早期的經驗科學主義以天人二分，價值中立，唯物機械的態度來改造征服現實存在的物質環境，相對上當然也比較容易忽略人存在本身的價值問題，成就了以「科學、經驗為優先的」環境改造思潮。

五、康德「人類中心理性」的環境探索

（一）理性主義與先驗哲學的對話

西方世界從十四世紀到十七世紀初，大約三百年的文藝復興之後，出現了一個短暫的、情慾的、人性過渡自由的、物質貪婪的「巴洛克」時期，催生了新古典主義與啟蒙運動。所謂的啟蒙運動，是指十八世紀工業革命時，德國、法國一帶所醞釀的大眾化民主政治思想活動，近代都將此一時期稱為「理性時代」（The Age of Reason）。

當時整體的環境知識理論是採取科學自然主義的立場，道德倫理則是採用相對理性主義或功利主義，在基督宗教神學方面，反對傳統的天啟說，而以「理神論」或「無神論」來取代。

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是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掘起於德國的偉大哲學家，他本著